

第一章 未来战争可能的 根源和原因

第一节 战争与政治

战争很久以来就具有经济根源和政治背景，但是，战争的真正目的及其爆发的原因往往被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动因所掩盖，因此，战争与政治的联系并非总能像 19 世纪时表现得那么明显，那么清晰，当时卷入战争的不仅有军队，而且还开始有群众了。

从克劳塞维茨时代起，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手段的继续，但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占了上风。然而，这里把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一是关于现代条件下战争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问题；

二是新武器的出现能否改变战争的社会—政治本质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一般来说，战争应当被排除在人类生活之外，给参战国和其他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核战争更是不允许的。但是，尽管这一要求具有明显的正义性，是时代的呼唤，然而，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悖，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的所有矛盾远非都是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武力仍在以各种方式使用。目前，还不能完全保证为数众多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不会转变为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如果坚持某种流行的新观点，就很容易偏离问题的本质，然而，现实中的某些现象却不会因为我们的指责或否认而不复存在。为了能对这些现象作出正确的反应，需要认清其实质。如果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政治已不把军事力量作为自己的工具，那么，无休止的战争和冲突又是什么呢？是什么导致了战争和冲突呢？

阿尔巴托夫院士写道：“即使在有限冲突中，也不能把它当做达成合理的政治目的的工具——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规模高于格林纳达、巴拿马和福克兰群岛的冲突中。”^③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把合理的政治同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的

军事力量——作者注

② 马尔维纳斯——译者注

阿尔巴托夫：《同代人的证明》，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俄文 1991 年版，第 345 页。

确是不明智的。但是，除了合理的政治外，还存在不合理的政治，它将产生其本身所固有的那些现象。而且，究竟什么样的政治是合理而明智的，什么样的政治是不合理也不明智的，对它的认识往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假定性，其解释也远不是单一的。

一些国家真心希望和平，而另一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却宣称“有比和平更重要的东西”，或“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东西”。然而，这两类国家都确信自己的政治是合理的。如果把战争强加给某一个国家，并使这个国家的独立面临威胁，那该怎么办呢？生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此不能避而不答。阿尔巴托夫认为，福克兰群岛冲突算作是合理的政治的手段似乎尚可，但是两伊战争、1991 年的海湾战争、正在高加索发生的战争，以及其他诸多动用军事力量的冲突又该作何解释呢？福克兰群岛冲突有可能转变为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改变其源自两个对抗国家的一定的政治目的的实质。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需要解释，这些战争缘何爆发，要达到什么目的。目前，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哪一场战争的爆发没有政治原因，也没有对所爆发战争的原因的任何其他解释。

即使是核武器，也不能改变战争（如果战争已经爆发）的本质。戈尔巴乔夫曾宣称：在广岛和长崎之后，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但是，在原子弹轰炸这两座城市之后，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参加了对日战争，这场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其目的是尽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连美国对日本两座城市使用原子弹这件事本身也并没有什么军事战略方面的必要性，它只不过是“冷战”前夕具有长远意义的政治目的所要求的。

小查尔斯在《波茨坦会晤》一书中写道，美国国务卿认为，“原子弹的主要优点绝不在于它对日本的打击程度。他说，使用原子弹将另有所图，即：使俄罗斯成为欧洲更容易被说服的人。^①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武器的真实的政治目的所在。

如果核武器在进一步扩散的情况下被重新使用（但愿不会如此），那么这样的战争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只能是某种非常不合理的极端政治的继续。任何有意识地使用核武器的举动（未经批准的发射情况除外），不论其结果如何，都必然是某种政治决定引起的。

至于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可以说，把战争排除在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都不应该是政治的手段和继续。

但是，如果战争已经爆发，那么这意味着，与这一绝对命题相悖，政治已将自己与军事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或者

《在国外》杂志，俄文版，1985 年第 30 期，第 17 页。

说为了自卫，政治被迫诉诸军事力量。我们希望看到某种现象是什么样或某种现象不应该变成什么样，以及它实际上能变成什么样，这之间是有原则性区别的。没人会赞成应该有偷窃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被盗，那么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偷窃就其实质来说仍然是偷窃。

有时有人还会说，应当摒弃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原因只是这一论断本身几乎就是战争的根源并孕育着战争。然而，这同我们指责因牛顿而存在万有引力现象别无二致。不是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引发了战争，而是他所揭示的那些客观原因和现象导致了战争。这些原因和现象是无法回避的。

对所发生的战争和冲突视而不见，把战争描绘成与政治无关、是自发产生的，意味着脱离实际和使自己丧失客观而现实地评价所发生事件的能力。

当然，政治本身和武装斗争手段所发生的质变使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变得复杂了。一方面，政治的作用与责任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核武器对政治的影响也在增大，以至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一些政治家正确地指出，新武器越来越多地被政治所渗透，并最终似乎与政治融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器本身正在成为政治。为了消除战争，特别是核战争，所有国家都应改变其政治，使其符合当今的现实，否则，就有

可能应验克劳塞维茨早在 160 年前发出的警告——战争迟早将摆脱政治的监督，成为集体自杀的手段。而那些认为现在政治与战争之间已毫无关系的没有根据的看法，则会使人们偏离事物的本质，并使人们在引发战争主要根源的问题上误入歧途，失去对统治集团的政治施加影响的能力，以及加大防止战争的难度。

第二节 军事威胁的新旧根源

回首过去，要求和平、拒绝战争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也是人类精英们所支持的事业。对此，只消回顾一下坎特关于建立爱好和平的民主联盟的倡议、拉塞尔和爱因斯坦的宣言等事例就足够了。交战国之间曾无数次缔结“永久和平”。然而，在人类 4000 多年的历史中，总共才有 300 年左右的绝对和平时期。在其他时间，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连绵不断。

仅在我们所熟知的这段历史中，就发生了 14000 多场各种战争。

世界各地武装冲突的策源地在当今时代依然存在。即使“冷战”结束后，世界也并未变得更加稳定。它甚至变得更不安全了。

所有这些战争的基本原因何在呢？如果抛开表面的和口头

的掩饰，那么可以概括地说，主要原因在于：霸占别国领土、物质资源、财富和人力（奴隶）的欲望；形形色色统治者征服其他民族，甚至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对殖民地及他国领土、资源产地、经济和政治势力范围的占领和拓展。成为侵略行动目标和受到侵犯的民族与国家则被迫为自身的生存、主权和独立而斗争。

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人们知道，曾发生过大量的宗教战争。本世纪，在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和“冷战”时期，主要的全球性矛盾，就是由在所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和西方国家“搞垮共产主义”，并在全世界确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决心所引起的。

一些历史学家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得出结论，没有一次长期冲突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然而，实际情况是，有些军事冲突又派生了其他冲突，而冲突的起因却始终没有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战争都毫无意义和徒劳无益，都没有促进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许多民族正因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才维护了本民族的自主与独立。几个世纪以来，总有人企图瓜分和奴役俄罗斯，而在自身的曲折历史中，俄罗斯不诉诸军事力量，就难以生存下来。18~19 世纪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人们还知道德国土地是怎样通过“火与剑”而得到统一的，统一的日尔曼国家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或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组成反希特勒联盟的各国认为战争是卑劣的营生，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并且不摧毁法西斯，那么人类将倒退数十年。

根据上述理由，历史经验就不能完全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若干世纪以来的冲突毫无疑问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多余‘支出’，”说其多余是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们从来都不是不可避免的。^① 如果这里指的是战争或军事冲突，那么显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但也不能忘记，进行战争的有侵略者、征服者，也有被迫自卫的一方，而战争对于各方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并不能给出单一的答案。

美国国防大学研究员汤普逊提出了安全保障的一些新原则。他的主要思想是，由于使用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战争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不可能局限于参战的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参加这种战争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可以接受的主权权利。对军事实力进行监督正在成为一项国际政治特权。基于此，21世纪安全保障政策的首要原则是，实现国家安全不应当使用威胁手段，而应当使用保障他国安全、放弃单方面军事力量以维护相互安全、利用国际武装力量确保惩罚侵略者等方式。一些国家的安全将取决于其削减本国单方面军事力量的程

切尔尼亚克：《若干世纪以来的冲突》，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俄文1988年版，第376页。

度，并且按照国际协议在保障相互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作者最后讲道：“在世界上利用多国联合武装力量维持正义，这是共同安全的最终目标和 21 世纪国家安全模式的本质所在。”^① 对这样的观点只能表示欢迎。但是，这样的倡议和愿望过去也有人提出过，而眼下却没有一个国家认为可以完全放弃国家的军事实力。

但是，岁月更替，使用军事力量，甚或无限制地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已经转变成为关乎全人类未来的一个全新主题。正因如此，就需要根据新的现实来思考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由于“冷战”和全球性对抗的结束，在人类历史上似乎第一次有可能出现防止战争的更为现实的机遇。甚至还提出了“新政治思维”的思想，这一思想宣称，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世界上出现的国家间矛盾只应通过政治途径来加以解决。应当大大提高联合国的作用及其对国际局势的现实影响力。各个国家的安全和整个世界的战略稳定，将不仅也不可能在国家安全的框架内，而应更多地通过全球安全体系的建立来加以保障。基于此种期望，华沙条约组织被解散，随着苏联的解体，其原有领土上各共和国的军事安全体系也被破坏。

与此同时，世界现实的国际局势却未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汤普逊：《重新定义 2000 年及其以后的战略》，战略论文集，国防大学出版社，华盛顿特区，英文 1993 年版，第 105 ~ 124 页。

“冷战”结束后，大多数主要国家都就消除全球性对抗、缩减军备以及同昔日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伙伴关系而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与此同时，它们在国际事务中仍然首先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并且十分重视巩固本国的军事安全。

例如，在 1994 年提交国会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只字未提“全人类的利益”。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根据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而制定的……”即使是参加维和行动，美国也视之为“一种维护本国国家安全的手段，而非孤立的行动。”

在这样的条件下，从苏联分离出去的各共和国也被迫加强本国的安全。一些自负的政治活动家曾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轻而易举地解决世界上的所有全球性矛盾，而现在在一个不大的共和国内不使用暴力却连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看来，国际社会远未成熟到可以真正实施所谓“新思维”政治的程度。需要采取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的更为清醒的态度。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今后战争仍将永远伴随人类历史，或在发动战争的道路上将出现新的更为有效的遏制因素？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但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却大于以往任何时候。首先，历史积累的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全部

惨痛教训、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应有助于在发动战争的道路上竖起新的、更为可靠的屏障。与以往不同，当今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宣布侵略目的，并且全都拥护和平，哪怕是在口头上，仅此一点就能说明许多问题。大多数国家向着建立市场经济的民主法制国家的方向发展，应该促进经济和信息的一体化进程，降低全球性对抗。然而，英阿福兰克群岛战争的例子，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其他一些战争一样，证明市场经济不仅不能避免战争，而且其本身还可能促成战争的爆发。

所有这一切说明，需要采取防止战争的更为可靠的实际步骤和机制。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结果，是解决政治和经济矛盾的工具，那就有必要寻找影响国家政治的途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从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在此方面的活动，到提高联合国的作用，来阻止运用暴力解决矛盾的企图。

聂尔逊博士认为：“……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实力的体现，而且也是它们在不诉诸威胁或武力的情况下就能软化威胁的能力。在下个世纪，我们的安全战略应当更多地集中于后一个方面，藉此，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使安全实现‘跨国化’……在从现在起的未来 10 年中，建立地区性集体安全组织应当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①

《国际生活》杂志。俄文版，1993 年第 9 期，第 58～59 页

还需要建立调节国家军事活动的新的国际法规。例如，可以考虑制定一定的框架性规定，对国家军事学说所应遵循的共同要求作出规范。国家军事学说遵循的目的应当是保障相互安全，限制能对别国造成新的军事威胁根源的军事行动，巩固全世界现有边界的不可动摇性。对于欧洲来说，类似的协议已在赫尔辛基缔结。

但是，相互安全和全球安全只有在各国的安全和最低限度所需的自卫能力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无论怎样于理相悖，在世界的现实情况下，防御够用的国家军事力量本身，和国际社会以武力立即制止各种侵略的决心，仍然是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因素之一。核武器和新式高精度常规武器，仍将继续对发动大规模战争产生遏制性影响。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有助于从根本上减少发动战争和实现侵略性政治目标的可能性的新因素。

无论如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实现社会非军事化的必要性。恩格斯曾写道：“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我灭亡的萌芽。”它“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①但是，军国主义目前还有生命力，因为它的生存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客观政治和经济进程决定的。

即使在现代条件下也不得不承认，不但原有的战争根源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175页。

原因没有消失，而且不同国家和一系列地区之间新的十分尖锐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土和族际矛盾还在不断出现。国家内部经常出现尖锐的阶级和种族矛盾，它们导致国内战争和冲突，并且对周边国家构成危险。

莫德尔斯基和摩尔根（华盛顿州立大学政治学家）在研究了大规模战争和世界战争的周期性后，得出结论：“我们不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确信，过去的周期表明，在一般的政治变动过程中，如果找不到或不创造出战争的功能性替代物，就存在着出现这种战争的可能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争夺原料资源和生存空间将成为世界上最为尖锐的社会—政治和种族矛盾的主要根源。这一问题同人类未来发展的前途与道路这一更带根本性的问题相关。初看起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已由近期的历史经验作出。全世界正在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无限制地利用地球资源来无节制地扩大生产，这种状况是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的。

人们知道，全部能源中有 95% 是以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的不可再生形式转化而成的，只有 5% 是有源再生的（河流、海峡、海潮、太阳能）。原子能存在着广阔的前景，但

莫德尔斯基和摩尔根合写：《对全球战争的理解》，刊登于《解决冲突》杂志，英文版。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又说明在这方面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不谈其他许许多多国家，仅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一旦需要美国现在所需要的那么多资源，许多地球上的资源短期内就会被开采殆尽，而全球空间的污染将是危机性的。

正在无情减少的不仅仅是原料资源与水资源，还有森林、耕地、生态状况良好的地区。仅仅由于人为侵蚀的结果，世界每年就要丧失 250 亿吨土壤层。与此同时，地球上的人口却在增长。最近 20 年人口数量增长了 40% 多（16 亿人）。以这样的增长速度，20 年后地球人口可能达到 70 亿人。每一米耕地、每一升纯净水或者每一块在生态上适于生存的地块的价格将逐年提高，对它们的拥有权竞争也将愈演愈烈。

权威的国际科学组织、联合国的专家一致认为，再过 5~10 年生态因素将成为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现在就已清楚，西方正极力想使俄罗斯成为原料供应国和工业废品储存地，但是俄罗斯人民和社会对此是不能让步的。俄罗斯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提出了各种旨在克服结构性危机和恢复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构想。^①

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就是大多数民族永远也不会拥有 20~25 个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么多资源，即使它们走资本主义

^① 例如，格拉济耶夫：《技术经济长期发展理论》，莫斯科，符拉达尔出版社，俄文 1993 年版。

道路，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先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

它们该怎么办——是相互抢夺尚存的那点资源吗？它们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眼下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生活要求千方百计找到答案。许多民族在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以后，又陷入了对更富裕国家新形式的经济和财政依附。因此，争取真正独立的斗争任重而道远，并且还可能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不但不会停止，还会不断引起动荡和内战。

因此，国际社会迟早要面对对生产规模与性质进行一定限制、调整或根本转变的问题。如果联合国、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最大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找不到协调和调整生产与需求的途径和方法，那么各国人民的生存问题就将变得极为尖锐，争夺资源的斗争也将全面激化（尤其是在欧洲、近东与中东），同时将引起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对峙。基于此，也不排除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军事威胁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取决于未来世界将建立何种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将取代基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之上的两极世界。对这个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

部分政治学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认为，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多极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在今天看来已不可能。这一点连沃纳也承认，他强调说：“……如果美国企图单

独行事，这将超过它的能力。”^①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且还因为对于只由一个大国主宰世界，连美国现在的盟友，特别是德国、日本、法国也未必同意，更遑论中国和其他大国了。这些大国不这样做就无法为了国家的利益发挥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潜力。总之，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每当部分国家想通过加强军事实力来达到自身的绝对安全时，就会出现对他国的威胁，就会使竞争变得激烈。

另外一部分学者和政治家认为，如果东南亚、欧亚和中东一系列国家以中国为中心联合起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将来就有可能回到两极世界。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应当指出，以对抗取代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合作，将导致这些国家技术上的进一步落后，产生新一轮“冷战”和军事对抗。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在现有条件下，最现实和最符合国际社会长远利益的做法就是，建立客观上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它包括美国、西欧、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中国和日本这样一些力量和政治与经济势力中心。

还应当指出的是，以往利益的平衡是建立在 5~6 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大国的均势基础之上的。当前主要国家和正在形成

^① 《指南针》杂志，俄文版，1992 年第 75 期。

的力量中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却远不一致。美国、西欧和日本占据了世界产值的 2/3。

哈佛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约瑟夫·奈认为，“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分布使人想起了多层馅饼。最上面一层是军事层，基本上是一枝独秀，因为还没有能同美国相比的其他军事大国。中间层是经济层，已经有 20 年时间是三极状况。最下面一层为相互依赖层，是多国性的，其特点是力量分散”。^① 根据这一观点，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多数主要国家最终确信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客观必然性之前，还会有人试图建立单极或者新型的两极世界，这将导致国际形势的严重复杂化和破坏战略稳定性。

此外，多极世界国际形势的特点将是形形色色的国家利益有更多的表现，因此，它将比单极或两极世界更为复杂，因为只有基于各国利益的平衡，多极世界才能相对稳定。某些政治学家一般把和平与稳定看作是“由自身利益驱动的力量平衡作用的结果”。^② 然而，只有彻底改变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才能达成利益的平衡，而这在最近的未来还非常困难。

许多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涨，可能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发展和决定矛盾根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不能仅归结为狭义概念上的民族主义。170 个国家中只有 10% 是单种族国家。世界

《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俄文版，1992 年第 11 期，第 6 页。

《国际生活》杂志，俄文版，1992 年第 9 期，第 52 页。